

过去的中学

来源：http://whb.news365.com.cn/jrwh/t20060506_927926.htm

在人的一生中，中学阶段正是求知欲最旺盛、记忆力最好、想象力最丰富的时期，许多在各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光，之所以会常常心存感念，就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理想是从那里起步的，他们的知识基础是在那里奠定的，他们的精神气质是在那里形成的，最初的社会活动训练是在那里进行的。

长江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过去的中学》收集的是在不同领域颇有建树的名人关于老中学的回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过去的中学生在校时的学习、生活、成长的点点滴滴。

进校一律穿校服

——忆母校天津耀华中学

■资中筠

那时听家长们议论学校好坏，首先是讲师资、校风如何，很少听到“升学率”之说。

近年来，讨论“素质教育”成为热门话题。的确，在应试教育下出现的种种现象，实在令人对这样培养出来的下一代“社会栋梁”不能不担忧。当然责任不在孩子，而在家长、学校和全社会。但是学校在“升学率”的压力下也有一大堆苦衷，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我不是教育专家，无法解答。只是自己有幸在“好学校”受过几年教育。每当想到、见到有关教育的问题时，我就常忆起我的启蒙的摇篮，天津耀华学校。它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除了两年高小外，我都是在耀华上的。她所给予我的一切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再比之于现在的教育中的问题，觉得有许多值得一写之处。

想起耀华，首先想起赵君达校长。赵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回国后先为北洋大学教授。但他一直有志于基础教育。适逢耀华学校创立，他就下决心辞职应聘为校长，按自己的意图办一所完整的中、小学，这本身就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和理想主义。耀华最初是英租界当局，即所谓“工部局”，出资创办的。在极左思潮中此类学校一律被批判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实际正好相反，耀华学校之创建是出于中国人的意思。20年代，居住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批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国当局提出，他们向中国人征了这么多税，理应做一些有益公众的事，兴办教育是首选。这也正与当时西方国家在华办学之风一致，遂有此校。它的建筑十分讲究，红砖、白窗框，典型的英国式。但是学制、课程完全是面向中国人的中国学校。开始属英工部局管，不久，在20年代末“教育中国化”的浪潮中就由华人接管，成为一所私立学校，校名“耀华”，顾名思义也说明主办者的意图。

首先是校风。校训是“勤、朴、忠、诚”，赵校长治校极严，对校训身体力行。抗战前的耀华有“贵族学校”之名，一则因为它校舍、设备、师资等条件在当地首屈一指，其他学校望尘莫及。更因为它学生中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后代甚多，往往一家，甚至两代人都上耀华。某同学是袁世凯、曹汝霖、徐世昌的后代以及哪个当政的显贵和大富商的子弟，时有所闻。但是他们在学校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特殊化，决不敢摆阔，这只会引来同学讥笑。学费可能比一般略高一些，但并不过分，因为家境贫寒的学生也不少。绝对没有“分数不够钞票补”之说。进校门一律穿校服，很简单，不需要什么“设计”，冬天深蓝布袍子(天津称“大褂”)罩棉袍，夏天浅蓝布袍，上体育课白衣白裤。女生要求短发齐耳。这样，至少在校园内保证“不把双眉斗短长”。在那种环境中，学习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名门后裔功课不及格而留级也没有任何通融；学习出众者不论家境如何，都受到老师赞赏，同学尊敬。在纪律方面也很严格。赵校长在世时每天早晨都在大门口迎接师生，8点钟一打上课铃就关校门。迟到者只好在大门外站到第一堂下课再放行，那是很丢面子的，所以迟到者不多。听说有一次校长自己迟到，他也坚持不让门房开门，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这当然只是一个象征，纪律还表现在各个方面。后来8点关校门的制度没能坚持下去，但是朴素而纪律严格的校风一直到我毕业还能维持。

提倡德、智、体、群、美育全面发展，也是一大特点，例如体育是全市闻名的，每年全市运动会冠军拿得最多，全校性的运动会也常举行。除“主课”外，从小学到中学都有音乐、美术、劳作课。记得我就是小学三年级的音乐课上学会五线谱的。课外活动很多：歌咏团、各种球队、班级壁报……还有年终“恳亲会”，各班学生表演节目

给家长看。高年级还有课外生物、化学等小组。这些都是自愿报名，在老师指导下进行。还记得有一个志在学医的同学参加生物组，向我津津有味地讲初次解剖青蛙的兴奋情绪，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医学院……

更重要的当然是主课的教学质量。耀华文理并重。它的数、理、化是全市有名的，并在高考中显示威力；同时国文（即今之语文课），特别是古文也是强项。记得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作文言文。比较特殊的是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一年级在国文课之外加每周一堂“经训”课，从低年到高年依次为：《论语》、《孟子》、《大学》和《礼记》、《诗经》、《左传》。高中二三年级则改为中国文学史。当然只能浅尝辄止，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概念，不可能真的像旧时那样读经。但是有没有这个概念还是大不相同的。英文程度在抗战前比较高，不亚于教会学校，聘有外籍教师。不过到我上初中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都被迫改学日文，大家不约而同消极抵制，结果既没学好英文也没学会日文。抗战胜利后，与华北其他学校一样，英文变成一大弱点。眼看高考竞争不过南方的同学，校方特别加强英语教学，除加强师资力量外，要求其他课有条件的也用英文教，我的“范氏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老师就是用的英文课本，用英文讲课的，果然无形中对我们提高英语很有帮助。

这些都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这又和赵校长的创业思想和奠定的基础分不开。这一优势在赵校长身后，虽经国难，基本得以维持下来。那时中学各门课的教师绝大部分都是大学本专业的毕业生，而且经过严格挑选。他们有些人的学识丰富、循循善诱和敬业精神至今记忆犹新。例如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就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她讲得那样清楚而有吸引力，使我对数学发生浓厚兴趣，并且一旦学校要求用英文讲课，她也无难色，结果等于同时还要教数学英语。还有一位教三角和立体几何的老师，更加风趣，把许多定律、公式都编成了顺口溜，使这门令人望而生畏的课变成了很“好玩”的课。其他各科的老师都各有千秋，无法一一详述。在抗战以前，高水平的教师可以说是校长高薪聘来的。但是抗战爆发后，教师生活每况愈下，到解放战争后期物价飞涨时，那微薄的薪金简直难以糊口。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病了，我和同学去她家里探望，真的是陋室一间，四壁萧然，令人鼻酸。她付不起医药费，就这样挺过去，略好些就来上课。有的老师兼做一些家庭教师，在课堂上间或也发发牢骚，但是教学照样认真，对学生照样严格要求，一丝不苟。那时绝没有学生或家长向老师请客送礼之事，也不允许。我当时少不更事，一切视为当然，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那时没有评模范之说，以今日的标准视之，大部分老师都够得上模范教师。

那时听家长们议论学校好坏，首先是讲师资、校风如何，很少听到“升学率”之说……

“不许家里用汽车接放学”

■蓝英年

北京有所101中学，很有名气。但对这所学校的前身晋察冀边区联中，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晋察冀边区联中（简称边区联中）成立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从1946年至1949年，仅存在三年。1946年秋天傅作义的骑兵进攻张家口的时候，郝初校长把全校师生带入晋察冀边区，改名为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

那时候，我们用的数学教材是范式代数，先学小代数，后学大代数。国文课文除边区作家丁玲、艾青、赵树理、孔厥等人的作品外，还有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和陈白尘等作家的作品。当然都是作品的片段，但老师讲课的时候往往介绍他们的生平和创作。老师还介绍外国作家的作品，不仅给我们讲过《死魂灵》，还讲过果戈理写《狄康卡近乡夜话》时如何让母亲为他搜集乌克兰农村姑娘服饰的名称。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竟给我们讲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2004年我同两位同学去看国文老师，我问他怎么会给我们讲李后主的词？他说你们应当知道中国文化的精华。但选李后主的词他当时是有顾虑的，最后还是大胆选了。我问他后来郝校长知道吗？他说知道，但并没有批评他。国文老师还给我们讲语法，什么是主语、谓语、宾语和状语，并让我们用图表画出句子的成分。还讲体裁、人称、标点符号，比如什么是报告文学，什么是散文。历史老师讲到洪秀全的时候，口气颇为不敬，与传统的评价不完全相同。英文每周四节，课文是英文老师自己编的。现在只觉得英文课很有意思，但课文一点也记不得了。音乐老师更奇怪，教我们唱的歌多半不是革命歌曲，而是欧洲古典歌曲。记得一首歌词有这样两句：“那牧女在羊群中奔跑欢笑，祈祷上帝永远赐她平安！”总之，郝校长信任教师，让他们自己选教材，编讲义，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干涉他们的教学，颇有蔡元培先生的遗风。

我们学校有不少高干子弟，如刘少奇的儿子、任弼时的女儿等等，郝校长对所有同学一视同仁。不允许任何人

摆干部子弟的架子。进北京后，星期六有人用汽车接同学。好像有位同学说，他爸爸领导郝校长。一天郝校长把同学集中到学校操场，对同学们说，不错，你爸爸领导我，可我现在领导你们。干部子弟要带头学习好，团结好，而不是比谁爸爸官大。我们不是八旗子弟，不许家里用汽车接。郝校长对等级观念深恶痛绝。我们在西黄泥的时候，有位本村学生，爷爷是地主，要求上边区联中，郝校长收录了他。他年纪较小，分配到九班，与我同组。我们都同他很好，没人歧视他。学校从西黄泥转移的时候，学校带不带他是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郝校长毫不犹豫地把他带走。我们一起进北京，他后来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锅炉研究所，担任过所长和党委书记。他没有辜负郝校长的期望。后来到哈尔滨聚会时，他又谈起没有郝校长就没有他的今天，话里充满感激之情。

从来不突击考试

■钱学森

现在的父母对教育孩子很费劲，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受罪。

我是 1923 年至 1929 年在北师大附中学习的，离现在已经五十多年。当年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压在心头，老师们、同学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努力学习，为了振兴中华。我们班上，给同学们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的董鲁安老师。董老师实际上把这个课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我们就从那个时候懂得了许多道理，我们要感谢董老师。老附中师资水平很高，老师对学生很亲切。教生物的于君石老师，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我记得他给我一条蛇，让我做标本。还有教博物学的李士博老师，他教我关于矿物硬度的记法：“滑、膏、方、莹、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挺押韵的，好记，有用。这就是矿物硬度的十度，到今天我还背得烂熟。教几何的傅种孙老师，自己编几何讲义，用古汉语编。傅老师古文水平很高，教我们的时候还拉着腔调念讲义，很带味。他说：“你只要承认公理，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拿到火星上去它也是如此。”他的这个讲法好，彻底极了，火星上都是一样的，跑不了。我们的老师还有翁文颐、夏宇众等。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五十多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是终身影响着我们的。六年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我附中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第一年觉得大学功课没有什么，因为我在中学都学过了。上海交大四年实际上就学了两年，考上公费留学美国，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现在的中学能像当年附中那样水平就行。我建议找老校友讲讲当年学习的情况，总结一下那个时期的教学方法，进一步办好师大附中。

现在的父母对教育孩子很费劲，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受罪。放了学在学校里玩，不天黑不回家，不怕考试，不突击考试，没有考不上大学的，班里最好的学生考 80 分就行了。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附中的选修课很多，学生的知识面很广，每天午饭后，在教室里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当时师大附中很穷，经费不足，但是实验做得很多，化学实验室对学生随时开放。学生的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困难。师生关系密切，息息相通，对学生诱导而不是强迫。当时附中高中有些课用英文讲。到了高二要学第二外语，设有德语、法语。外语是情景教学，创造语言环境。现在的教育限制太死。要培养孩子们多方面的兴趣。我主张学生多学点文言文，可以采用多种教材。

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

■许良英

许良英(1920—)，浙江临海人，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1932 年进入浙江海门私立东山中学，1935 年考入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7 年因抗战爆发、高工解散而辍学，在家自学。1957 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被打成右派，回农村做了 20 年农民，期间主持编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在 70 年代陆续出版。

最爱上图书馆借书

东山中学是一所私立初中，规模很小，只有一百多个学生和十几个教师。创办人是当时台州最大的资本家，校

园原来是他在海滨小山上的别墅。里面有四座式样各异的凉亭，还有荷花池和各种精心培育的花木。在这样的校园里读书，当然是惬意的。我经常在亭子里看书，有时爬在树上小憩，观东海日出，迎着晚霞遥望天际故乡的括苍山，追踪进出港口的海轮，以及冬天在草地上晒太阳，都有无穷的乐趣。初中三年，我主要的兴趣依然是读课外书，而不满足课堂学习。二年级学化学时，自己读大本头的大学用书 Smith《化学通论》中译本，常发现教师讲错，这反而增加我对化学的兴趣。这位教师一副可怜相，说高中的功课多难，连上厕所也要看书，我就是不信。三年级上物理课时，自学了 Millikan 的《实用物理学》和苏联作家伊林等人的有趣读物。所有功课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物理，因为它能够解释自然界许多奇妙的现象……

由于我是全校最爱上图书馆借书的人，三年级时校方就让我负责管理图书馆。图书馆，从小学开始就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高小、高工时，一下课就钻进图书馆。初中图书馆很小，没有阅览室，课外看书大多在花园里。大学时，我通过为教务处绘讲义中的图和管理图书馆取得工读报酬解决零用钱(吃饭则靠贷金)。

高工的读书条件使我感到意外的满意，特别是我们的宿舍紧挨着浙江图书馆，有一个小门相通。图书馆两个很大的阅览室日夜开放，就成了我的自修室和休息场所，饭后就以浏览各种新到的杂志和报纸作为休息，使我眼界大开……

在高工，由于沾上了浙大的光，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国内外名人的演讲。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 1937 年 5 月下旬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iels Bohr)所作的关于原子核的演讲。当时《浙大日报》上报说他将来校演讲的消息，说他是“物理学泰斗”，原子构造理论的创立者。我就好奇地壮着胆去听。听众大约 200 人，高工同学可能就只我一人。会场很隆重，浙江省广播电台向全省实况广播。他用英语讲，没有翻译。我那时虽然已能阅读专业英文书刊，但没有受过口语训练，因此整个演讲只听懂开头一句：“Hangchow is a beautiful city”好在旁边有玻尔的一个儿子放幻灯片，我才懵懵懂懂地了解到点滴内容。这些印象，对我一年后决定学物理起了一定作用。

《万有文库》吸引着我

1937 年因抗战爆发、高工解散，我回到故乡，为了打发苦闷的日子，我每天用心啃一本有一千多页的工科大学参考书 Morecroft 的 *The Principle of Radio Communication* (《无线电通信原理》)，用蜂鸣器练习电报收发。又花了将近半个月时间，在一块大白布上画东南几省地图，市日(赶集的日子)挂在街头，作为宣传抗战之用。

3 个月后，我的精神生活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同院住的在海门民众教育馆当文书的姨丈家运来了大批书籍，这是海门民众教育馆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把一批刚从上海运到的新书全部运到张家渡。我和大哥向姨丈借了几百本书。大哥那时兴趣在钻老古董，即所谓国学，专门找一些大本头的古书摆在自己案头。我选的主要是新出版的《万有文库》第二集中有关物理、科学史、思想史、哲学方面的书。这批难得的新书强烈地吸引着我。第一本读的是 Infeld 的《物质与量子》，立即入了迷。接着读了自己两年前买的小册子罗素(B. Russell)1920——1921 年访华时的讲演录《物的分析》，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释》，Reichenbach 的《原子及宇宙》，Heyl 的《物理学之基础概念》，C. G. Darwin 的《物质之新概念》等 15 本关于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它们生动、扼要地描述了物理学在 20 世纪的新发展，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相对论和量子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物质与能量的等价性、四维空间、有限而无边的膨胀宇宙、波动粒子二象性、测不准原理等等。这些概念，我闻所未闻，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它们同我以前学过的古典物理概念完全格格不入，使我眼花缭乱，像进入了一个神秘的新天地。我意外地发现这一科学思想的新大陆，真是又惊又喜，于是它就成了我忘却眼前的苦闷、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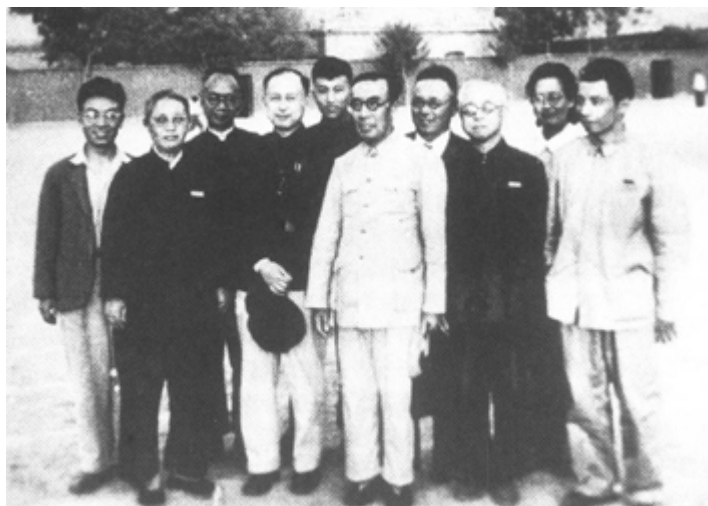
整整半年我都沉醉于这种狂热的喜悦之中。我从初中起对物理学一直非常感兴趣，想不到它竟还有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是一个多么奇妙、迷人的领域，我下决心要终生在这里面驰骋。

爱因斯坦启迪我思索人生

就在这个时候，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引发了我对个人命运的思考，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这以前，我不喜欢(实际上也不懂)抽象的哲理，以为这是“形而上”的“玄学”，而我要学“形而下”的科学和技术。改变我这种幼稚看法的是爱因斯坦 1934 年的文集《我的世界观》。此书的中译本 1937 年 1 月于上海出版，译者为叶蕴理教授。我于 1937 年 2 月就在杭州买到了。当时觉得抽象难懂，没有认真读它。现在则硬着头皮，下决心要把它读懂。我以前读书贪多图快，往往囫圇吞枣，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学会逐字逐句地反复思考、领会，把不懂或似

懂非懂的地方彻底搞懂。由此，我终于领悟到精读的价值和乐趣。这位伟大科学家的许多关于人生和人类事务的发人深思的精辟论述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例如：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叶蕴理的译文有些地方不大好懂，这里引自我自己主持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



1955 年钱学森(前排左二)回国到北师大附中看望老师南开中学是一所名校，这是重庆南开 1941 级部分学生留影



南开中学是一所名校，这是重庆南开 1941 级部分学生留影



蓝英年就读的晋察冀边区中学